

回 | 顾 | 与 | 展 | 望

——评定“馆员”的感想

赵 厚 源

北京图书馆的中级职称已经评定完毕，我被评定为“馆员”。这对于已到中年的我来说，当然算不上什么“殊荣”，但是，应该说，这基本上符合我的实际情况。

这次职称的评定，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知识、知识分子的重视和关怀，反映了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则是一次极好的学习、总结和提高自己的机会，是对每个人的政治思想、学识水平、业务能力、工作成就的一次检验。它不仅可以总结过去，使我们清楚地认识自己所走过的道路，而且可以让我们正视自己的现在，明确今后的努力目标，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

我于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61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图书馆工作，至今已有21年了。在这21年中，我都是在第一线作直接为读者服务的工作，而其中大部分时间又在目录室作目录辅导工作。

二十余年来，我接待过数百万人次的读者。曾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查书借书，为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全国的科学研究机构以及重点生产建设单位、重要文艺团体提供过书刊资料，同时也为大量的一般读者作了一些服务工作。

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广大读者给了我不少的知识 and 教益，同时我也用自己有限的一点知识和技能为他们服务。工作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他们那种为党为国勤奋学习、坚持不懈、刻苦钻研的精神使我感动，激励我更加努力地工作。多年来，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使我对全馆的目录体系及各主要文种目录的情况，对图书与目录及其划分原则、标准和方法比较熟悉。基本上掌握了

馆藏各类型、文种、年限的分布情况以及各主要文种目录所使用的分类法、目录著录条例和目录组织规则。在运用查目方法上比较熟练，能从多种途径查找读者所需要的书。对读者的目录咨询问题能够认真负责、清楚准确地予以答复。对于读者在查书中的疑难问题，能利用工具书扩大查找途径，千方百计为读者解决。对于本馆缺藏的图书，能够向读者推荐其他的收藏单位，避免读者不明情况而浪费时间。在查书过程中，能够发现卡片著录和目录组织上的问题和误差，如有的书分类不当、有的卡片排列混乱、有的卡片著录杂乱、互相矛盾等等，并能向编目部门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十几年来，目录室对中外文图书采访工作、对各主要文种图书目录的编目工作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基本上均是由我起草、归纳意见并定稿上报的。

近七、八年来，由于工作需要，我一直主持目录室工作。在工作中，能够团结同志、通力合作。对于目录室本身的业务建设也比较重视。在工作中，能注意积累各种必要的资料，如难查图书的资料，中、外文重要图书的资料，中国古代著名作者的外文译名资料等等。同时还修订或重订了目录室的各项规章制度，如“目录室工作规程”、读者“查目规则”、“目录简介”以及各文种目录的说明等等，均由我起草并定稿。

为了帮助青年同志熟悉业务，曾为阅览部门的青年同志讲解目录知识、介绍馆内目录情况。在阅览部1981年举办的关于如何利用北京图书馆的读者讲座中，曾多次向北京市各系统的科研、生产单位（如电子、机械）等介绍馆藏目录情况。这对于普及目录知识、帮助读者掌握查目方法、更好地利用北

京图书馆起了一定的作用。

为了把工作搞的更好,我曾经结合工作对业务中的某些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讨。1964年,北京图书馆举行第一次科学讨论会,根据当时阅览部的安排,由我执笔起草了《关于读者工作中“区别对待”问题》的文章(未公开发表)。该文结合阅览工作实际中产生的问题,论述了“区别对待”原则在阅览工作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了划分读者、保证重点、照顾一般等原则和方法。这在当时的工作中起了有益的作用,并与后来国务院所批示的我馆重点服务对象的原则精神是一致的。本文所提出的这些原则和方法,至今仍为我馆阅览工作所沿用。实践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原则。(当然“区别对待”的原则并非此文和我馆所首创,苏联早有“分别服务”之说,在我国的科研系

统的图书馆也早已应用此原则。)

近几年来,我又结合工作写过两篇文章,即《谈图书划分与借阅问题》与《谈谈我馆的目录辅导工作》(已公开发表),并与杜克、吴慰慈二同志合作编写《我国图书馆事业建设》一书(已出版发行)。

本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可以进行的更快、更好的。本来,我们每个人是可以取得更多的成绩,进步的更快的。但是,十年浩劫给我国各方面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损失,也使我们已到中年的这一代人失去了一段最宝贵的时间。业务能力和学识水平的停滞甚至下降,知识和技能的老化,是我们必须正视而又重视的问题。业务的进一步提高,知识的不断补充和更新,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发奋图强,为振兴中华作出更多的贡献,作出更大的努力!

“人生有限 学海无涯”

谈 金 铠

我于1954年在北京四中高中毕业。因为学校离馆很近,在校上学期间我就经常到馆里来看书学习,从那时起,北京图书馆这座知识的宝库便强烈地吸引着我。所以,1956年4月我能够来馆参加工作,从进馆的第一天我便爱上了图书馆工作这一行。当然,那时我的思想觉悟并不高,对图书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也不十分明确,想得更多的是,来到这样一个学习条件优越的工作岗位,今后可以多多看书,好好学习了。

参加工作不久,党中央便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在此期间,广大科学工作者和研究人员来馆查找资料的人猛增,他们为了发展我国科技事业而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的精神深深地激励着我,从而使我对图书馆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有了初步的认识。同时,我也开始想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图书馆工作者,应该如何做好为读

者服务的工作,在向科学进军中贡献自己一份力量。但是当时毕竟因为自己参加工作时间短,业务水平低,工作能力差,而大有“力不从心”之感,心里十分焦急与不安。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学,刻苦地学,快马加鞭地学,以适应形势的需要及业务工作的需要。“文革”前,我馆是晚九点半钟闭馆,我几乎每天都学习到闭馆时才离馆回宿舍,就是节假日也很少有例外。

要想学习获得比较理想的效果,我的体会是,首先要有刻苦的精神,其次还要注意学习方法。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学,切忌好高骛远。当时,我对图书馆学和目录学几乎一无所知,所以必须从基础知识学起,以后又进入图书馆红专大学学习,学习逐步深入和系统化。我做西文期刊工作,学习外语是必不可少的工具,